



不卑不亢有时强硬的伯乐

这些年,能让人们联想起“监制”这个职位的名人,不难看出,都是叱咤一时的知名导演们——王家卫、陈嘉上、吴宇森、徐克、冯小刚、贾樟柯、姜文、周星驰、宁浩等等,他们作为监制,是极富亲和力的,因为他们是导演出身,即便是要对投资人负责,也不会克扣得太猛了,从某种意义上来说,他们是伯乐,而不是监工。

■文 | 毛予倩 ■图 | 资料

尽管,内地的监制制度尚不足以摆到台面上来说“强大”,但具有中国特色的监制们正以略带温情的一面摸索着自己的出路。

从某种角度来说,那些名导演做监制的目的,倒不是让自己看上去斤斤计较,反而是带着发掘新人的目的。“我经常考虑,能够给这个导演什么帮助。我希望不是因为名气的关系,而是因为我们互相合作,能够产生火花,这样才有意义。”曾在内地做过一些电影监制的吴宇森说,他通常会先看剧本,觉得导演很有才华,但一时不得志,投资上有困难,就会去想办法帮忙,而帮忙的方式,就是以监制之名为其打造电影。

以前,经常会在一个剧组里出现两种制度、两种想法,现在,至少大家都知道要在共同的艺术追求下,朝一个地方努力了,这是监制的功劳,润滑做得好。

最近的事实是,王家卫监制的电影《逆光飞翔》6月8日就要上映,他也正是看中了导演张荣吉的才华,想要给新人一个机会。这样一部看起来不那么商业的《逆光飞翔》,在台湾地区取得了极好的票房和口碑,于是,大家盛赞王家卫的目光如炬。可惜,王家卫虽是那种“知道这个电影该往哪个方向走”的监制,但却绝不是功利的那一种,甚至,还对媒体偶尔的“势利”有所不满:“你们现在的思维啊,有时候太功利了,在拍电影的时候,不会有这样的想法。”

然而,让监制们有些苦恼的是,他们这些颇有人情味的做法,并不是每一次都能得到共鸣。香港的金牌监制张家振就道出了一个事实,来找他帮忙的内地导演很多,“但他们中间的绝大多数人,都是想拍文艺片,想去电影节上拿奖。而内地那些会拍商业片的导演,比如宁浩、陆川,他们自己都能拿到钱,也不用来找我。”

千万莫以为香港监制们独霸了内地影坛,事实上,内地的电影人也没闲着,姜文监制过陆川的《寻枪》、宁浩监制过《边境风云》、冯小刚还反过来监制过陈国富的《风声》,黄建新更是内地的监制大户。

以上的这一幕幕,多少让华语电影圈显得如沐春风,这样中国式的监制制度,倒不是不可为。

对话王家卫:

被模仿或者被取消都是一种手段

Q:《逆光飞翔》就要在内地上映了,作为监制,当时怎么会选择这部电影的?

A:最早的时候,我是看了导演张荣吉拍的短片——《天黑》,我觉得这个内容很不错,很吸引我,就是这个电影的内容讲的是盲人的故事,但是这个导演有眼睛。你知道的,职业习惯,就在想能不能拍成长片呢?后来就开始合作了。

Q:现在很多香港导演都在内地做监制,怎么有的第一次?

A:那个时候,《阿飞正传》让我面临压力,因为香港一直是以票房论英雄,一部这么大“卡司”的电影居然不卖钱,他们就会感觉这个导演很危险,就会把我列入黑名单。我要做其他电影,投资商就觉得我们给你故事,我们要求你怎么去拍才可以。可是不相信这一套,我不相信电影只有一个拍法。还有最主要就是那个时代的制片人都很懒,什么东西好卖,他们就赶快照抄一个收钱,但是电影不该只有一个类型。还好我们赶在了“王晶时代”,你自己做电影也可以,只要有故事,有演员。我们就开始尝试这样去做,自己做监制,找演员,拿一个故事卖给制片人,然后做自己想做的电影。

Q:《逆光飞翔》因为有出征奥斯卡,让大家印象深刻,之前,最让大家记住的监制是《东成西就》呢,风格太不同了,怎么回事?

A:《东邪西毒》的时候,一开始我就和刘镇伟约好了,我拍《东邪西毒》“真金版”,他拍《东邪西毒》“搞笑版”——《东成西就》。结果我拍太慢了,那么大的卡司到了1993年11月——快过年的时候,我才只拍了十分之一,我就跟刘镇伟说那你就先拍搞笑版吧。刘镇伟说那怎么成,“真金”没出来,“搞笑”倒先出来了。我说那你就先“搞笑”,然后我从“搞笑”里提出“真金”,所以,就变成了我做《东成西就》的监制了。那个时候,电影被相互模仿这种事是很正常的,大家都玩得很开心。电影被模仿或者被取笑都是一种手段,他们一定有一个理由在里面。他们需要一种喜剧感,这也是一种手段。

Q:做过监制,会不会对影片整体的把控有一种强迫症在里面?

A:我们现在做制片不是我个人,是一个团队。这么多年下来,我们与海外发行的伙伴有了一定的默契,知道这个电影该往哪个方向走。因为我做过监制,也做过出品人,我不能说,拍了这个电影之后,就不管它的死活。我认识现在中国有很多好的导演、演员,但是我们最需要的是非常专业的、优秀的制片人和监制。而且这方面人不多,我们急需加强这块。